



共和国大将的1927

张 丽

1927年,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北伐战争取得了巨大胜利。但随后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与反革命势力展开殊死搏斗之际,28年后成为共和国大将的革命者们或者直接参加南昌起义,或者听从党组织安排开展其他形式的革命活动,或者历经坎坷辗转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于波澜壮阔的革命大潮。

直接参加南昌起义

20岁的粟裕在其家乡湖南省会同县担任农民协会筹备处主任。马日事变后,他在党领导的北伐军第24师教导大队接受训练,并于1927年6月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党中央作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决议以后,粟裕参加了南昌起义,担任起义军总指挥部警卫队班长,与战友们协同完成了策应朱德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3军军官教育团起义的任务。在与敌人激战过程中,他头部中弹不省人事,在战友的帮助下才得以脱险并追赶上起义部队。

24岁的陈赓在北伐军第2方面军担任特务营营长,同时指挥着武汉市工人纠察队。他是湖南湘乡人,并已于1922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陈赓以他所掌握的武装力量保障了党的五大在武汉安全召开。汪精卫七一五“分共”后,陈赓听从党组织安排直接参加了南昌起义,负责起义总指挥部的保卫工作。因在与敌人激战中身负重伤,他不得不四处求医。

21岁的谭政同样来自湖南湘乡。他在念书

期间不仅自觉接受《新青年》等进步刊物所宣传的先进思想、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而且热切希望投入到火热的国民革命实践中。在同窗陈赓的帮助下,他于1927年3月在汉口加入国民革命军第4方面军总指挥部特务营。特务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革命武装,谭政接触到不少共产党员并进一步吸取了进步思想。在反革命集团进行大清洗的白色恐怖笼罩之下,谭政紧紧跟随党组织步伐,毅然参加了南昌起义。此后,他又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随部队到达井冈山,于1927年10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岁的许光达在国民革命军第4军担任炮兵营见习排长。他是湖南省长沙县人,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8月,他奉命由九江赴南昌参加起义。虽然他到达南昌时起义部队已经撤离,但此后他在江西宁都追赶上了担任起义军后卫的第25师周士第部。他被编入该师第75团3营11连任排长,很快就投入了会昌战斗。

在党组织安排下开展革命活动

27岁的徐海东在国民革命军第4军担任炮兵营见习排长。他是湖北省黄陂县徐家桥村(今属大悟县)人,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军队内部左翼人士遭到迫害,他在党组织安排下离开军队潜回家乡。在黄陂,徐海东被任命为河口区农民自卫军队长。他通过创建党支部、秘密发展党员、组织游击队发展革命势力,有力地打击了地主反动武装。针对革命队伍涣散、思想落后、纪律性差等问题,他为农民自卫军制定了4条纪律:集合不准说话、不许穿长袍、不许吃乡亲的东西、不许打骂乡亲。

25岁的黄克诚已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勇于参加北伐战争,在国民革命军第8军担任营、团政治指导员。大革命失败后,黄克诚奉命回家乡湖南省永兴县秘密从事农运工作。当时中共永兴县特别支部盲目执行中共临时中央“左”倾盲动主义,决定组织农民武装暴动。黄克诚对革命的客观形势作出了审慎的判断,他认为暴动时机尚不成熟,并向党支部提出了先做群众工作、积聚革命力量,再根据条件适时举行暴动的正确主张。

24岁的萧劲光来自湖南长沙。他分别于1922年、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并于1925年被正式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2军第6师党代表,被授予中将军衔。四一二反革命政

变发生后,萧劲光旗帜鲜明地与反革命势力进行斗争。他在南京宿松天主教堂召开的第6师讨蒋大会上,痛斥蒋介石背叛革命的罪行,喊出了“反对独裁”“打倒蒋介石”等口号,受到了官兵的热烈响应。七一五“分共”后,萧劲光按照中共党组织的指示于1927年到苏联列宁格勒军事政学院,系统学习军事理论和政治理论知识。

35岁的张云逸在国民革命军第2方面军第4军第25师担任参谋长。他是广东省文昌县(今属海南省)人,已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张云逸根据党组织的指示,继续留在国民革命军内部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在他的秘密掩护和大力支持下,他所在部队大部分人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

22岁的王树声在其家乡湖北省麻城县担任农民协会组织部部长。经中共麻城县秘密组织的发展,他已于1926年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麻城逃窜在外的反动土豪劣绅纠集上万反动势力进攻革命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麻城惨案。值此危亡之际,王树声受中共麻城县委委派只身突围去武汉求援。在王树声的指引下,援军很快便解了麻城之困。国共彻底决裂后,针对日渐猖狂的反动势力,王树声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参与组织领导了“九月暴动”,并于1927年11月率部参加了黄麻起义。

辗转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毛泽东评价罗瑞卿:往身边一站,就感到十分放心。天塌下来,有他顶着。这位从四川南充走出来的民族脊梁,在1927年有着不同于其他大将的经历。1926年罗瑞卿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成为国民革命军中的一名士兵。1927年5月,他参加了反击叛军夏斗寅部进攻武汉的战斗。在革命与反革命

势力激烈斗争的漩涡中,他逐渐认清了旧军队的腐败本性,并从旧军队中脱离出来。他多次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但“苦于不得其门”,一直没有机会入党。在辗转找寻党组织的路途中,又因病几经生死。通过不懈努力,罗瑞卿于1928年在上海找到了党组织并如愿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据《学习时报》

闻一多治印

1938年2月18日,闻一多为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的学生上了最后一课,他鼓励学生说:“中国,不是法兰西,因为,中国永远没有《最后一课》!”然后,他便与200多名师生徒步行程3000余里,历时68天,随学校迁至昆明,之后在新成立的国立西南联大继续任教。

随着抗战的不断升级,昆明经济凋敝,货币贬值,物价飞涨,联大教授们的生活急剧恶化。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中,大名鼎鼎的教授过着贫穷的生活。据说,当时昆明的乞丐都不找他们要钱,大家都说:“教授教授,越教越瘦。”

一次出门,一个乞丐追着闻一多要钱,他无可奈何:“别追了,我是联大教授。”乞丐扭头就走:“你早说嘛,害得我白跟了你半天!”当时,流传的顺口溜:物价一日三跳,有如脱缰野马。由此可知,大教授们穷得叮当乱响。

闻一多全家老少八口人,生活捉襟见肘。为了买米下锅,闻一多把自己穿的一件心爱的皮大衣送进当铺,又把从北平带来的几部古籍卖给学校图书馆。他在家书中无奈地写道:“书籍衣物变卖殆尽,时常在断炊中度日……”

目睹闻一多每况愈下的苦难生活,有的教授提醒他去治印。因为闻一多早年赴美留学时主攻美术,治印对他来说是轻车熟路。闻一多思考再三,决定挂牌摆摊,刻章治印,贴补家用,留下了“文字是战斗的武器,刻章刀是我挣钱养家的工具”的铮铮之语。

闻一多治印,操守极严。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书记、代省主席兼民政厅厅长李宗黄请闻一多刻印,许以丰厚酬金,他断然拒绝,并将玉石原样退还。可是,当和平民主运动组织需要印章,闻一多却分文不取。

从1944年4月到1946年7月,闻一多留下了1400多方印,可见治印之勤,经济之窘迫。闻一多的印作大多收入《闻一多印选》。闻一多的印刀法刚健,疏密有致,有笔有墨,给人以雍容、古朴的美的享受。冯友兰、朱自清、吴晗、华罗庚等都保存有闻一多为他们刻的印,一直视为珍宝。 张雨 据《人民政协报》

李四光荐书



1969年5月19日,李四光随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在接见在京参加学习班的科技界学员代表后,两人一起到休息室单独会谈。

在一个多小时谈话中,他们从天体起源聊到地球起源、生命起源等问题,当谈到太阳系的起源问题时,毛泽东对李四光说:“我不大相信施密特,我看康德、拉普拉斯的理论还有点道理。”

毛泽东紧接着又转过话题,对李四光说:“我现在对科学挺有兴趣,你能不能给我找点书?”李四光问道:“主席想看哪方面的书?”毛泽东就用手在面前画了一个大圈,说道:“我就要你研究范围内的资料。”他请李四光帮忙搜集一些国内外的科学资料,特别强调自己不懂英文,最好是中文的资料。

李四光回去后,仔细查找了研究地质方面的中外著作和最新资料,但又发觉它们都过于专业,并不适合毛泽东阅读和思考。于是,李四光把自己的著作和论文《地质力学概论》《地质工作者在科学战线上做些什么》,以及老一辈著名地理学家章鸿钊的专著《石雅》,一并呈送给毛泽东,并写了一张便条:“给您找了一些,但是不太适合您看。我给您写一本吧。”

为了节省毛泽东的时间和精力,李四光认真整理出一份地质学资料,其中融合了中外地质学说中各种学派的观点和自己的分析意见。这就是1971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科普读本《天文·地质·古生物》,该书后来成为李四光晚年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

周惠斌 据《人民政协报》